

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

# 制度的形式与 国家的兴衰

——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杨光斌摇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前摇摇头

四年前,基于对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现场进入式观察,我萌生了研究中国政治与市场互动关系的想法。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最生动、最典型地体现了政治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使我对已经持续多年的关于政府与企业关系的传统理论表述有了新的反思和认识。但这首先还是一种感性体悟,若要将这种感性体悟上升到理论高度,尚需借助于理论的力量。作为一个已经在大学讲授了十几年政治学理论和中国政治的学者,我不能说不关注、不了解有关的新理论、新流派。然而,惭愧地说,似乎所有的所谓新理论都只是我脑海中的匆匆过客,难以在我的思维深处停留,尽管有时也会以所谓的理论、范式吓唬学生。但是,对中国政治经济过程的现场进入式观察却使我突然发现:我的现场观察体验其实就是制度经济学已经和正在解释的政治经济现象。国有企业所有问题的主要症结并非管理者和经营者个人,而在于制度安排。而制度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的核心就是解释制度之于经济和市场的价值。于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范式、术语成为脑中挥之不去的影像。制度!制度!难道不是制度问题?我开始“迷信制度”,甚至是“崇拜制度”。

“崇拜制度”其实就是回归政治学的传统。没有制度,就没有政治生活,就没有人类文明,因而制度是政治学的传统,是政治学的本义,也是政治学之所以成为政治学的基础。在政治学的发展历程中,制度是贯穿其中的主要经脉。在古典主义时期,政治学的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讲的就是城邦的政治制度,其所划分的三种政体模型影响至今。传统主义时期的洛克、孟德斯鸠是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更是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设计师。后来的马克思关于制度、产权、国家和

意识形态的论述至今令人耳熟能详,也是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一个直接的理论来源。和制度主义前辈一样,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的理性和选择是在给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我们可以坚定地说是,制度是政治学的核心价值和当然传统。

二战以后,政治学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专门研究个体行为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勃兴。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看来:传统的制度主义具有整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特征,具有制度决定论的倾向,从而忽视了制度框架中行为主体的影响;制度框架内的行为主体是有偏好的,而行为主体的偏好集甚至可能改变制度安排而实现制度创新。于是,个体行为研究成为政治学的热门话题。行为主义政治学很快陷入困境,因为它不能解释为什么相同的行为会有决然不同的后果,而这显然是因为制度安排在作怪。

个体行为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但政治学的制度传统同样不可忽视。伴随着制度经济学的流行,政治学及时地汲取营养,调整自己的方向,形成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政治学不但要研究个体行为偏好,还要关注政治行为与制度框架的关系。

四年前,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认识和介绍并不系统,本人的学术认知也没有超越当时的学术环境。为了寻找解释性的理论路径,我不得不全面阅读翻译过来的制度经济学著作。随后,我在《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中初步提出一套用于分析中国政治经济过程的“制度范式”,即:制度结构(杂~~体~~结构)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安排(杂~~体~~安排),制度安排决定或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杂~~体~~绩效)(简称“杂~~体~~范式”)。该范式在本书的《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运用“杂~~体~~范式”研究政治变迁时,作者深刻感受到制度和道德之于常态政治变迁的价值。但是,奥尔森居然以霍布斯主义的“丛林规则”式的利益计算来分析国家兴衰,奥尔森的招牌式概念——“集体行动的逻辑”居然依然在流行。为此,我在《国家兴衰的集体行动理论解析》一文中,除指出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外,还系统地论证了该理论本

身及其运用中的误区。

我关于制度政治学的知识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除了前述的制度经济学和自己的现场进入式观察体验外,第三个方面就是本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认识。秦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一直是政治权力全面主导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情形;新中国各项架构的形成更是政治架构在先、经济秩序在后。记得大学二年级时,政治经济学老师曾讲到公有制经济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和自然结果,幼稚的我顿时陷于迷茫:公有制经济明明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建立起来的,怎么成了必然和自然的结果?无知者无畏,问为什么,当然是不得其所以然。今天,源自西方的制度经济学终于给出了答案:国家是产权形态的制造者、规定者和保护者。商业力量一直居重要地位的西方国家其政治经济关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直由政治力量主导社会的中国了。

三种知识来源所形成的制度政治学意味着具备自己特有的内涵。第一,与制度经济学不同,制度政治学更加关注制度结构中的政治制度对于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这种侧重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历史和现实。我国的制度经济学家能否认同这一点,还得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判断。第二,不同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的流派纷呈(除了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学者们还总结出规范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和利益代表制度主义),以“~~制度~~范式”为核心的制度政治学是一种中观的整合性理论,尤其适用于大历史的比较研究和国内政治经济变迁研究。“~~制度~~范式”中的要素是可以取舍的,这一点有些近似于历史制度主义。作者之所以将“~~制度~~范式”定位为中观的整合性理论,是因为作者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并不满意。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新制度主义,说到底都是研究制度与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为了研究问题而进行专门的路径区隔,反而会陷入为理论本身所困扰的境地。我这样说并非是出于学术素养轻浮,诚如下文所言:

新制度主义的几个分支都强调相同的问题,即当表达偏好的制度背景深刻地影响表达出来的偏好时,弄清楚人类行为想要什么是

非常困难的。制度研究者没有通过考察个体心理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集中于关注将个体意愿整合为集体决策的规则和程序的影响,不管这些规则和程序是那些正式政治制度、自愿的联合体、公司,还是认知或解释框架。

既然共同的研究兴趣是潜在政治需求与最终结果之间的黑箱,那么,预先界定这个箱子的内容就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规范的‘制度’定义就是不可欲的。共同的研究议程就是对制度影响的研究,无论它们在何处或通过何种方式发生。<sup>①</sup>

作为一个学者,当然重视理论路径的价值。但是,社会科学的活力源泉在于“学”与“问”,即学问。学习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如果仅有学习而无问题,就丧失了学习的价值。而事先给社会科学研究设定一个细微的路径,肯定会限制发现问题的能力,研究就变成一个“学问把式”,结果可能就是“以因正因而生变果”。基于此,我所提出的“~~制度~~范式”更加具有中观包容性。制度就是制度,新制度主义的三个流派划分就已足矣,不必再去做更多流派的区隔。

以“~~制度~~范式”为指导,本人开始了大历史研究,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第一部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研究的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第二部是已经完成了的《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研究的是明清以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第三部是正在顺利进行中的《国家的兴衰:制度变迁的视野》,以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大国兴衰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式。整个系列从当代中国推演到近代中国,再由近代中国推演到世界范围内的大国研究,试图以新制度主义理论重新认识和解释历史。本人的研究之所以由政治学理论推演到比较政治发展和历史领域,一是因为制度范式对于大历史研究具有特别的适用性;二是出于本人对历史和比较政治发展持续的兴趣和关注;三是作者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研修外交学专业,也算是受到了国际关系专业的专门训练。这些背景决定了本人的研究是跨学

<sup>①</sup> [德]伊梅古特:《新制度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载薛晓源、陈家刚主编:《全球化与新制度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7—158 页。

科的,是以政治学理论来研究比较政治发展和历史。幸运的是,上述每一项研究都得到有关部门和基金会的支持,否则本人的系列研究不可能得到快速的推进。

《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是一部文集性质的作品,算是制度变迁系列研究中的论文成果。虽为文集,却成体系,构成“制度理论”、“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三个密切关联的部分。其中大部分论文已经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感谢有关刊物对论文以文集的形式再次发表所表示的理解与支持。

特别感谢《大国》杂志创办者高全喜博士。我和全喜博士是典型的以文会友,未曾谋面,先已神交,颇似古人的风雅之举。他在《国家利益》中体现出的深厚的法哲学修养令人折服,我的大国兴衰研究也是其兴趣所致。共同的关注使我们得以清茶相叙,是次茶叙更使我相信我们是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对政治发展上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理论和国家现实问题、对大历史观等都有类似的观点。也正是这次茶叙,谈出了《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祝福《大国》一路走好。

感谢我的同事和朋友黄嘉树教授。嘉树教授是国内外首屈一指的台湾问题专家,研究领域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他的智慧闪现。在与他探讨我的制度理论时,他提出的问题显示出一个大智大慧者的敏锐眼光。与他的交流大大提升了我的研究水平。

感谢我以前的研究生郭敏女士和韩金旺先生为本文集的贡献。《全球化时代的政党适应性转型研究》和《经济转型时期国家经济行为二重性研究》分别是郭敏和韩金旺硕士毕业论文的核心部分。他们已经走向商业领域,其在事业中的表现与他们的论文一样优秀。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感谢帮助过我的所有师长、同事和朋友,他们的帮助使我的研究得以更加顺利的进行。

当本书即将交稿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决定成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所”,规划把“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建设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研究的一个亮点。前方的道路需要我们开拓,我们知道探索的艰辛,但也有信心开辟出一条阳光大道。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依然处于理论评介阶段,尚不在主流话语之列,本人运用制度理论进行比较政治发展的研究也是属于探索性的尝试,因此不足、不当之处难以避免,希望广大读者、专家批评斧正,也期望更多的同行加入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中来。

杨光斌

圆园年 元月 圆日于北京阳春光华家园

# 悦的晕裁晕裁对摇目摇录

## 第一部分摇制度理论

第一章摇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	
——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	猿
摇摇一、现代化研究的若干方法	远
摇摇二、制度很重要	园
摇摇三、制度范式	缘
第二章摇国家兴衰的集体行动理论解析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 与误区	猿
摇摇一、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利益集团	猿
摇摇二、以集体行动理论否定并取代社会学 与政治学的基础性概念和理论	猿
摇摇三、经不起逻辑推敲和历史检验的国家 兴衰论	源
摇摇四、利益集团 政治体系中的次体系	缘
第三章摇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缘
摇摇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问题 与整合	缘
摇摇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运用	远
摇摇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争论 与拓展	愿
摇摇四、结语	苑

## 第二部分 比较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

### 第四章 大国的兴衰

#### ——制度变迁的视野

摇摇一、东方帝国的衰落	苑苑
摇摇二、西方世界的兴起和英国霸权的形成 (员缘园—员缘园)	苑怨
摇摇三、追赶英格兰(员缘园—员缘园)	愿员
摇摇四、群雄并存的年代(员缘园—员缘缘)	愿源
摇摇五、两极时代(员缘缘—员怨园)	愿苑
摇摇六、中国的崛起	愿愿
摇摇七、结语：制度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愿怨

### 第五章 政治的形式与现代化的成败

#### ——几个前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比较

摇摇一、中国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何以 引而未发	怨猿
摇摇二、法国与西班牙何以发展缓慢	怨愿
摇摇三、英国何以成功	员园源
摇摇四、结语	员园苑

### 第六章 文化重于制度？

#### ——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兰德斯 的《国富国穷》

摇摇一、“文化会使局面几乎完全不一样”？	员怨怨
摇摇二、国富国穷的根本：文化还是制度？	员园园

### 第七章 全球化时代的政党适应性转型

摇摇一、政党适应性理论回溯	员园苑
摇摇二、政党适应性转型的背景分析	员园缘
摇摇三、转型社会下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	员员员
摇摇四、结论与探讨	员员员

## 第三部分 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 第八章 功败垂成的自强运动

——中国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失败的

新制度主义分析

猿

摇摇一、政治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猿

摇摇二、制度安排：组织形式和制度建设

猿

摇摇三、制度安排：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猿

摇摇四、制度安排：意识形态

猿

摇摇五、结语

猿

第九章 政治上的“丛林规则”与经济上的  
宪政规则

——北洋政府时期资本主义工业

勃兴的制度分析

猿

摇摇一、军阀政治的“丛林规则”

猿

摇摇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黄金时期”

猿

第十章 统治者利益最大化与农业产出  
最小化

——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

制度分析

猿

摇摇一、权力危机下的南京国民政府

猿

摇摇二、农业政策的失效与政权的危机

猿

摇摇三、结语

猿

第十一章 计划经济的停滞与市场经济的增长  
——中国国家权力结构与运行

的制度分析

猿

摇摇一、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权力结构

猿

摇摇二、计划经济下的制度成本

猿

摇摇三、经济转型中的权力结构	圆猿
摇摇四、经济转型中的制度成本	圆源
摇摇五、结语：国家竞争力的制度基础	圆园
第十二章 经济转型时期国家经济行为的 政治学分析 ——以股票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为例	圆猿
摇摇一、导论	圆猿
摇摇二、我国建立股市的政治变量	圆苑
摇摇三、我国股市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变量	圆苑
摇摇四、政府当前在股市中面临的困境	圆员
摇摇五、困境的解除	圆远
第十三章 制度化等于现代化？ ——制度化权利的制度成本	圆园
摇摇一、制度化与法治	圆园
摇摇二、我国经济转型中的权利制度化	圆源
摇摇三、制度成本	圆怨
摇摇四、结论	圆员
第十四章 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与企业关系的 制度成本研究 ——以公司组建与上市为例	圆猿
摇摇一、组建企业的制度成本	圆猿
摇摇二、公司经营的制度成本分析	圆远
参考文献	圆缘

# 第一部分

## 制度理论

# 第一章 以制度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观

## ——现代化研究的新视野

很多国家现代化尚未完成,就被卷入了全球化。其实,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和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一样,说到底都是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于是,总结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就成为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一个永恒的智性课题。但是,学术界对这一课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认识。同时,在政治层面上,关于发展模式的争论也成为世界各国政治政策冲突的一个焦点和各国国内政治派别政见分歧的重要原因。在发展模式问题上达成共识将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课题,本文并不奢望实现这样宏大的意图。本文所要做的是表明这样一种主张,即:在思考和总结人类政治发展与历史变迁的经验时,心中首先应该有制度的观念。

制度难道不重要?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否认制度的重要性。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sup>①</sup>和制度变迁的历史,我们认为,从两千年前东方的秦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共和国以至今天的世界诸大国,一个国家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组织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形式决定的。因此,在观察世界历史尤其是各国现代化进程时,必须对制度的作用给予充分的重视。

在政治学的知识范围内,制度像一条蜿蜒的长河,由源头贯穿而下。从亚里士多德以至洛克、孟德斯鸠等,其思想精髓虽多为规范性内容,但

---

<sup>①</sup> 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剑桥欧洲经济史》(前猿卷),王春法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上还处于梳理和评论阶段<sup>①</sup>,尚未形成自己成熟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在经济史学和历史研究中,新制度主义的运用更有待进一步拓展。<sup>②</sup>

本文试图借鉴前人有关研究成果,在世界历史(尤其是现代化以来的世界历史)背景中,探讨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提出研究现代化途径的制度范式,并以现代化开始以来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对制度范式加以验证。

为了证明制度范式的解释力,本文首先简单地梳理有关现代化的研究方法。

## 一、现代化研究的若干方法

现代化研究是西方社会科学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的热门话题。其后,虽然全球化研究日益汹涌,现代化研究却并未受到冷落。由于发展时差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始于 20 年代,并于 30 年代中期到达高峰。<sup>③</sup>

在现代化理论大师亨廷顿看来,作为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研究,其主要途径有体制—功能法、社会过程法和比较历史法。体制—功能法的核心是研究功能如何维护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平衡,它主要是详细描述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模式,而不是描述一个体制向另一个体

<sup>①</sup> 按时序,重要的述评和梳理主要有:俞可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载上海《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载刘军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7年版;朱德米:《新制度政治学的兴起》,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陈明明:《比较现代化·市民社会·新制度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1997年第1卷第1期;祝灵君:《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1期;郭中华:《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研究的三大范式》,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杨光斌:《新国家理论评述》,载《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期。

<sup>②</sup> 例如,中国资本主义史研究的代表学者汪敬虞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年版)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代表学者赵德馨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经济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均少有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子,这无疑限制了其解释力。但是,在赵德馨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911—1949)》中,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

<sup>③</sup> 应该说,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关于现代化理论和历史的研究代表了我国现代化研究的前沿水平。参见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